

符号学开拓丛书(第二辑)



赵毅衡 主编

走向反讽叙事

——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

董迎春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符号学开拓丛书(第二辑)

走向反讽叙事——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

董迎春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反讽叙事: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
董迎春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 3
(符号学开拓丛书. 第 2 辑)
ISBN 978-7-5672-0388-4

I. ①走… II. ①董…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3595 号

书 名: 走向反讽叙事: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

作 者: 董迎春 著

责任编辑: 王 娅

策划编辑: 汤定军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印装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 - mail: tangdingjun@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33 千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388-4

定 价: 45.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序诗：时辰之诗^①

最坚硬的石头常常来自黑暗
唤醒
早起的黎明。
孤独与时间，
一起消失在沉思的语词

我心，
当作双手
此时，选择静止的时辰
犹如钟摆，
仅仅止息于墓地

我赤脚走在月光铺成的河床上
捡拾潮汐弃留的
沙砾，
以记忆
在子夜唤醒微风的名字

最坚硬的石头常常来自黑暗
唤醒
早起的黎明。
遗忘的，犹如回响！？
在子夜召唤陌生姓氏

^① 此诗献给我的导师阎嘉教授以及攻博期间时常聆听其教诲的赵毅衡教授，三年的耳濡目染让我看到学术道路的艰辛与美好。

导 论

在这些矜持而没有重量的符号里
我发现了自己的来历
在这些秩序而威严的方块中
我看到了汉族的命运

——赵野：《汉语》

第一节 当代诗歌研究现状

中国新诗 90 年的发展，出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大众化”讨论、40 年代“民族化”讨论、50 年代重新提出的“大众化”讨论、60 年代“颂歌体”与“战歌体”，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处于某种纠缠当中。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诗歌完全走向“政治抒情”，由此可见，“从 50 年代的牧歌式欢唱到 60 年代与理性宣言相似的狂热抒情，以至于到‘文革’十年宗教式的祷词——诗歌货真价实地走了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①。只有到“文革”结束后，诗歌才开始向一条更为健康艺术自主的道路发展。这样的历史语境，无疑对后来的当代诗歌研究有着潜在影响，即不断受制于它的政治性。

当代诗歌史中最为繁荣、最为显著的部分，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朦胧诗”与“第三代诗”。这两种“诗潮”构成了 80 年代重要的文化景观。“朦胧诗”作为普遍认同的文化形式有效地成为那一代人精神与抒情的突破口，“朦胧诗”成为对“文革”展开反思

^①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 年第 1 期。

最有效的文学形式之一。诗歌凭借其短小的形式以及其蕴含的哲理性迅速成为大众所喜爱的文化形式,特别在年轻一代中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许多在今天的文坛上成为著名作家的文学青年大多是从 80 年代的诗歌中汲取文学养料,从而走向更深远的文学创作道路的。

当代诗歌研究更多侧重于文学史线性梳理与社会意识形态批评,很少研究史料、观念、审美等艺术特征背后话语的深层关系。显然,当代诗歌研究相对于其他文学与理论研究,显得略为滞后一些。它处于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地位,也很少成为当下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中心。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 80 年代,旨在探讨 80 年代的诗潮的整体研究、诗歌话语的局部研究、当代诗歌史的重写研究,而这些层面的展开研究构成了 80 年代诗歌话语的整体认知。话语分析的意义重在揭示话语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蕴,同时呈现作为文化形式的 80 年代诗歌是如何参与同期文化建构的。

目前,80 年代诗歌研究的资料极其匮乏^①。除了一些重要的诗歌选集之外,与 80 年代相关的理论文献,主要集中于部分博士论文和不多的几本相关著作中。

博士论文包括:

《“他们”作家研究:韩东、鲁羊、朱文》(常立: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论文选择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群体”之“他们”为研究对象,描述“他们”的历史形成和发展历程,概述“他们”作家的整体风貌和共同的美学特征,并重在同中求异,以韩东、鲁羊、朱文为研究重心,深入阐释具体文本,论述单个作家独特的作品风格和诗学理念,并指出作为一个“作家群体”,“他们”的主要

^① 当代诗歌史的研究论著非常有限,较有影响的也仅有两部,分别是曾经修订过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与作为“21 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之一的《中国当代诗歌史》(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高校中当代文学中的诗歌教学内容也仅局限于“朦胧诗”与“第三代诗”这两个部分,而且“第三代”诗人也仅有限地提到了韩东、于坚等几位。当代诗歌教学与当代诗歌研究一直处于某种边缘化地位,这两本“当代诗歌史”成为当代诗歌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对当代文学史“当代诗歌”教学欠缺部分的有效补充。

文学影响还在诗歌领域以及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但是,这篇论文涉及的话语研究部分并非很多,所涉及部分也仅是一般作家作品的梳理性的研究。

《朦胧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比较研究》(秦艳贞: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论文从人的发现和文的自觉两个方面对“朦胧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截取中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这一横断面,研究中西文化对诗歌发展的内驱力——试图认识它们“共同的文学规律”和“共同的美学据点”,研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接受过程中的“影响”层面、被接受和改造的程度以及遭拒环节——力图展示民族集体无意识和传统美感范畴的外来影响。通过比较,作者针对当前诗坛状况探讨当代诗歌的出路,以期提出“本土化”的诗歌艺术构想:关注人的生命情怀与生存处境,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从而在体制与市场的双重压迫中实现诗人和诗歌艺术的崇高使命。该论文重点论述了“朦胧诗”的加入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融汇到世界现代主义诗歌的洪流中去,成为中外文化交流色彩鲜艳的一翼,其中关于“朦胧诗”的影响的研究对我们研究80年代诗歌话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理论意义。

《中国当代大陆诗歌形式研究》(陈龙: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论文的考察对象是1949—1989年间中国内地当代诗歌的形式特征。论文首先反思了诗歌社会学批评方式及其局限性,指出了建国40年诗歌批评尚未进入真正的多元话语时代。由此,提出了在诗歌研究中引入“本体论”研究、将诗歌研究作为文学科学研究对待的主张。这种集中关注诗歌“文学性”的研究方式,最终将落脚于诗歌的形式研究。同时,该论文借鉴西方形式批评理论成果,廓清了“文本”、“语言”、“结构”等形式研究的基本概念,将建国40年诗歌的形式研究界定为建立在诗歌语言分析基础上的内、外形式研究。该论文将研究对象的结束时间定在“1989年”,对本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霍俊明:首都师大博士论文,

2006年)论文试图以既有的中国当代新诗史^①和当代文学史^②的新诗部分作为阅读和考察的起点,以期通过对新诗史写作当中的问题揭示和辨析引起今后的新诗史写作实践和相关研究的注意。这里面对“朦胧诗”话语的重新认知,以及当代诗歌史的写作问题的重新审视等对本书中80年代诗歌话语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上面这类研究文献,显然与真正的诗歌话语研究还相距甚远。绝大多数研究仅是诗歌史的梳理、一般审美特征研究,理论批评也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审美批评。就“诗歌话语”研究而言,较为重要的有李志元的博士论文《当代诗歌话语形态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这篇论文“在西方理论话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指出当代诗歌话语分析的六个因素,分别为语境、主体、意象、诗性、读者、语言,从这六个维度展开分析,找出80年代诗歌背后的解构/建构的意识形态编码关系”。此论文话语的分析方式对本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话语启示,让当代诗歌的话语研究形成由外部“向内转”的趋势。

与80年代诗歌话语研究相关的几本公开出版著作包括:

汪剑钊《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③,其中第四章“回归与超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与第五章“终结与开始:后现代主义”皆清晰地阐述了80年代诗歌的整体流变。吴尚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转型论》^④,其中第六章“跨越断裂:崛起的现代诗群”与第七章“二次变构:后朦胧诗后现代诗群”,从“艺术转型”的角度分析了80年代的话语现状。王昌忠《中国新诗中的先锋话语》^⑤一书从先锋个案、先锋类型、先锋诗学三个维度考察了中国新诗的先锋话语,对当代诗歌论述也较多。但是其“话语”与“先锋”的含义不够明确,涉及的个案、类型、诗学未能全面展开,

① 作者书中所涉及的“当代”新诗史是指主要对发生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新诗现象进行书写的史述著作。

② 作者书中指涵盖在20世纪文学史中对“当代诗歌”的叙述部分。

③ 汪剑钊:《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北京:文化出版社,2006年。

④ 吴尚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转型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⑤ 王昌忠:《中国新诗中的先锋话语》,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

略显粗疏。张宏《声音的诗学》^①有三分之一章节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分析了80年代的诗歌,对本书的研究有一定借鉴价值。

著作中较为重要的是张桃洲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②,此书旨在探讨:(1)处于“现代性”境遇中的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给定的语言材料——现代汉语和言说空间,将自身的“现代”经验付诸“现代表达”;(2)现代汉语如何被中国诗人用来将自己的经验转化为诗;(3)语言与经验如何在诗人的倾力熔铸下获得“现代”的诗形。但是此书没有具体理论去分析当代诗歌话语,在理论上显得单薄,因而,这种话语分析相对来说没有落到实处。从文化角度研究80年代诗歌话语,可以较清楚地认识到80年代诗歌如何在80年代文化运动中扮演其重要的文化角色。显然,研究80年代的诗歌运动(文学思潮)、诗歌(从语言切入),以及被人们经常反思的文学史的建构中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问题,这些都与文化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建构有很大关联。本书根据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理论,来考察80年代诗歌的“情节编织”、“论证模式”以及最终揭示的“意识形态意蕴”,通过对80年代诗潮的整体观照、80年代诗歌话语的语言层面剖析、当下重写诗歌史的解构建构的研究,来还原80年代诗歌的文化现场以及维系其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关系,发现80年代诗歌解构建构话语转义背后普遍存在着“文化现代性”的焦虑。

诗歌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在80年代构成重要的文化样式之一,参与了同期意识形态的建构。“文化以各种形式揭示出理想性的东西:希望、欲求、灵性。文化的天地,给人在日常劳作的悲观之中,展现出一幅乐观的情境:美、快感、和谐、美德、宽恕、真理、正义。在这些功能中,文化具有一种批判性质,在它对理想或更美好的生活肯定里,隐含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③80年代的文化扮演了重要的启蒙角色。选择80年代诗歌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旨在探

① 张宏:《声音的诗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 (德)于尔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论文集》,序,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6页。

究 80 年代诗歌作为文学场背后所渗透的意识形态意蕴。当然,这种意识形态并非政党意识形态,而是符号背后的意义问题。80 年代诗歌是一个文本符号,而话语研究则指向了它的意义考察。因而,本书在梳理 80 年代诗歌时,尽量保持客观、中性的种种相关的时代文本、文学文本等分析,不断揭示出种种语境中的相关符号的意义。显然,80 年代诗歌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也是多重的,绝非政治的意识形态(意义)。

在海登·怀特那里,意识形态不完全是政党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些词旨在充当一般意识形态偏好的代名词,而非充当特定政治派别的象征”。按海登·怀特自己的解释,一般的意识形态倾向包括对把社会研究还原为科学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做法之可行性所持的不同态度;对人文科学所能教的课程所持的不同看法;对维护或改变社会现状之可行性所持的不同概念;对改变社会现状所采取的方向和促进这种变化所用的手段或不同构想。最后,还代表着不同的时间取向(把过去、现在或将来看作理想社会范式的时间取向)。^①显然,“一种历史编纂的风格代表了情节化、论证与意识形态蕴含三种模式的某种特定组合”^②。

本书考察 80 年代诗歌话语,分析了作为“情节”(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的)的“诗歌文本”与“诗歌运动”、用对诗歌文本、诗歌事件的“阐释”对应“论证”(形式论的、机械论的、有机论的、语境论的),从而在 80 年代诗歌话语整体背景下,通过对社会思潮(社会文本)、80 年代诗歌不同阶段的诗歌语言(文学文本)的符号学考察,揭示 80 年代各阶段所对应的不同的意义,也即 80 年代诗歌背后所揭示的意识形态意蕴(无政府主义的、激进的、保守派的、虚无主义的)。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在任何文化中都存在一个普遍的符号象征体系,它由无数能够激发社会的想象、欲望、

①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 6 页。

②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 37 页。

恐惧与抵抗的符号组成。智慧的艺术家的建构引人共鸣的故事,可以有效把握意象,尤其是他们对语言这一文化最伟大的集体创作非常敏感,所以他们擅长操纵这个象征系统,他们从文化的一个领域抽取象征材料,将它们移至另一个领域,增大它们的情感力量,改变它们的含义,把它们和不同领域选取的材料联系起来,改变它们在更大的社会图景中的位置。^①文学成了多种符号组成的社会文本之一,文学在功能上也具有文化性。80年代的“诗歌话语”同样也是一种“文学场”^②,他不断与政治相纠缠同时又在挣脱政治,它们构成了80年代最重要的且最有影响的文化景观之一。考察作为文化的80年代诗歌,就是考察这种文学话语背后渗透的意识形态意蕴,同时揭示隐藏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任何哲学与理论,都旨在描述思想运动过程,或对意义试图进行揭示。海登·怀特话语转义中的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四种隐喻^③之间的转义关系,包括情节编排、论证模式与揭示的意识形态意蕴。本书考察的80年代作为重要文化样式的诗歌重在“情节编织”(即主要诗潮、主要诗人、主要作品,包括被遮蔽的诗潮、诗人、作品),在这种诗歌史料梳理与考察的过程中揭示背后渗透的意识形态,这是社会文本、文学文本作为符号的意义。当然,话语转义往往以一种中心化、秩序化的诗歌话语为主,也同时兼有其他话语形态的存在。但作为整体论的考察,我们则重点审视这种中心化、秩序化的诗歌话语的意义。由此可见,80年代诗歌的社会文本、文学文本也相应地对应这四个话语阶段,通过不同意义的考察来揭示80年代诗歌话语背后渗透的强烈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揭示对我们梳理当代诗歌史及重新审视80年代文化的现代性,有

① Frank Lentricchia (ed.). (2000).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230.

② “文学场”,即“文学生产场”(the field of literary production),是人类学、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结构和历史视野辩证统一起来的一种文学观,文学场由许多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形成,具备不同习性和文学资本的行动者进入文学场,争夺位置的占有权。这一点在“第三代诗”运动中体现较明显。

③ 从一种宽泛意义来讲,一般都被称为“隐喻”。隐喻涉及意义与表达,在修辞、诗学、语言以及思维诸领域内的转换与生成。但是此处的隐喻是认识论意识的思维阶段。具体参看后面的隐喻解释。

着重要的意义启示。

因此,本书通过对 80 年代诗歌话语的分析,考察 80 年代文化不同话语阶段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蕴问题。本书所指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所谓权力关系,侧重于话语权力机制,可以这么说,只要有机制的空间,便有权力关系的存在。文学也是一种机制,所以在文学内部同样存在某种权力关系。不同的话语阶段的文本符号到底以何种意义呈现出来,便是话语权力运作的过程。

诗歌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透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遮蔽,考察诗歌话语在整个社会实践过程和社会结构中的运作情形以及二者间的内在关系,在深广的文化背景中去解读、揭示和重现诗歌话语形态、结构规则及其真实意义。

诗歌话语实践和其他形式的话语一样,其命名意味“实践”——一个社会化、文学化的符号的生成,通过文本形式被人们所认知。学理性、谱系学的梳理,则是对其后意义的体悟与反思。显然,诗歌话语分析中的话语概念,被视为意识形态文化实践的一种形式,一种具备自身特殊审美形式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诗人才有可能与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诗歌话语在整个社会实践过程和社会结构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它本身是社会思潮与当下文化的再现。诗歌话语反映了整个社会实践过程和社会结构,并在各个层次上与社会意识形态互动;诗歌话语在社会意义上又有助于整个社会实践过程和社会结构的建构,包括对它自身的形式及其背后的身份、关系和价值体系推动着的当下文化及理论的建构。

第二节 80 年代与话语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是本书考察的时段;而话语分析,则是本书所参照的理论视角与意义旨向。我们首先对 80 年代与“话语分析”这两个概念进行时间与学理上的界定。

一、80 年代的界定

著名学者甘阳写道:“八十年代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

代。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在今天的人看来或许不可思议:‘文化’是什么?这虚无缥缈的东西有什么可讨论的?不以经济为中心,却以文化为中心,足见八十年代的人是多么的迂腐、可笑、不现代!但不管怎样,持续近四年(1985—1988)的‘八十年代文化热’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意识的一部分,而对许多参与者而言,八十年代不但是一个译注青春激情的年代,而且也是一个纯真朴素、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①显然,80年代是一个理想的时代、一个激情的时代,这也是决定中国命运与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角逐较为激烈的时代。而本书要探讨的诗歌话语正是80年代有效的组成部分与核心事件。

在80年代,诗歌作为文化的重要形式,一直推动着同期文化的发展。相对而言,以往诗歌是被当作政治的宣传工具,而80年代的诗歌渐渐返回诗歌自身,重新走上审美的道路,让中断了的中国新诗传统在80年代得以复活,即开始在注重审美、诗性的语言本体道路上介入同期文化。或对“文革”展开反思,比如“朦胧诗”;或对诗歌与当下提出新的认知与实践视角,比如“第三代诗”。“80年代是中国新诗的复活节。它所展现的激励人心的诗新生的场景,系由两个方面的努力所构成:被批评家称作新的崛起的‘朦胧诗’运动掀开了中国新诗史壮丽的一页;与此同时,是中国新诗传统艺术精神的恢复和发展,使受到至少长达十年窒息和损害的新诗呈现出来。”^②

1976年4月5日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一场气壮山河、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诗歌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文学意义上,也许这场运动被放大,但作为历史的记忆与文献的价值,它呈现给了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一种总体性、整体性视角。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历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界点,由于政治的需要,它被赋予了结束一个旧时期或开启一个新时期的文学史意义。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那

① 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② 谢冕:《编选者序:转型期的情绪记忆》,谢冕、唐晓渡主编:《鱼化石或悬崖边的树——归来者诗卷》,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页。

是一个思想解放时代真正到来的时期,从此,中国也进入了文化上的改革与开放进程。在没有网络、视觉图像也不够发达的年代里,诗歌无疑构成 80 年代较为重要的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消费形式。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对于西方现代文学以来的“荒原意识”产生了重要的认知价值,与从“文革”、“地下诗歌”开始孕育的郭路生、黄翔、北岛、多多、芒克等人的诗歌对于 80 年代文化的意义也颇为相似。80 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诗歌成为文化的重要形式的时代。1976 年左右的“地下诗歌”无疑成为 80 年代的重要内容之一。

1989 年 3 月 26 日,海子于山海关卧轨自杀。“朦胧诗”之后,80 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运动暂时告一段落。海子自杀不久,顾城、戈麦等一系列诗人自杀,“自杀事件”成为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重要的“文化事件”。正如著名学者王岳川写道:“1989 年,确实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关键性的历史时刻。经过这一外部世界性剧变和内部心灵域的裂变,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和起点凝聚起一个巨大的历史寓言,同时也将一种空前的历史困惑和价值分裂留给了 90 年代的人们。”^①同时,整个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即从政治文化的中心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消费文化,诗歌暂时从文化的重要地位中消失,很快被散文、小品文等其他消费型、快餐型的大众文化形式所取代。

显然,“1989 年”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给当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诸多影响。比如西川认为海子的死给他本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1989 年发生了几件大事。我的两个挚友^②的去世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们死了,而我活着。我感到耻辱和负疚。我感到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我认识到了魔鬼的存在,我认识到宿命的力量,我看到真理的悖谬性质,我感到自己在面对事物时身处两难之中……”^③1989 年意味着某种断裂与转型,也意味着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80 年代的最后一

① 王岳川:《中国镜像:90 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 32 页。

② 指海子与骆一禾。

③ 西川:《大意如此》,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年,第 245 页。

年,对于中国现代诗,既是一个终结,也是新的开端”^①。同样,欧阳江河也写道:“1989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属于那种加了着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脱离出来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②显然一系列诗人的自杀事件的确给人不祥之感,也意味着某种文化与精神危机的到来。

本书中80年代考察的时段主要指从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到1989年的对诗坛影响与冲击较大的“海子自杀事件”,这两个重要的“诗歌事件”作为80年代诗歌考察的开端与结束。

80年代诗歌并不全是在80年代创作与传播的,有的创作完成在“文革”十年,甚至更早,然而其产生影响却是在80年代,它们也被纳入80年代诗歌研究的范围。文革的“地下诗歌”和后来“朦胧诗”被关注的作品绝大多数创作于“文革”期间,或者甚至更早以前就完成了,“朦胧诗”的“合法化”的时间并非是“朦胧诗”写作的时间,像北岛、顾城的许多诗歌都写作于70年代,正如青年学者霍俊明写道:“必须澄清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事实。一般的大学教科书和诗歌批评从业者几乎都长期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认为‘朦胧诗’出现于1978年底。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朦胧诗’并非出现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甚至也不是始于1978年12月北岛、芒克等人创办民刊《今天》,而是更早,这就是长期被忽视和过滤掉的处于‘潜在’和‘隐含’状态的白洋淀诗群。确切地说,‘文革’时期的白洋淀诗群孕育了此后的朦胧诗,或者说,白洋淀诗群是朦胧诗的前史阶段,后来的朦胧诗主将北岛、江河、芒克、多多、林莽、严力都是白洋淀诗群的重要成员。”^③显然,1976年以前的“地下诗歌”创作也是80年代诗歌考察的内容。如果没有

① 周伦佑:《90年代中国现代诗走向》,陈超主编:《最新先锋诗论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04页。

②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49页。

③ 霍俊明:《经典的纪念碑与阴影:“朦胧诗”的再反思》,《文艺报》,2008年6月26日。

“文革”时期“地下诗歌”的沉淀与积蓄,也很难有 80 年代初“朦胧诗”的耀眼辉煌。

1989 年意味着诗歌话语的整体转型,当然许多诗人的写作时间可能在 80 年代晚期,但其发表与产生影响却在 90 年代初,比如像臧棣、西渡这一批诗人。还有更多诗歌作品或者有影响的诗人也在不断被挖掘,而在 90 年代以后才被文学史发现与认同的,那些诗人诗歌也被纳入本书考察的时间范围。

因此,本书把研究 80 年代的诗歌的时间大致放在“1976—1989”期间,沿袭绝大多数文学史以政治地标进行文学分期的依据,70 年代末与 90 年代初的诗歌话语也包括在 80 年代诗歌话语研究范围之内,显然,80 年代前、后在时间性上并未完全割断,也与 80 年代诗歌都有着某种深刻关联。

确定 80 年代这一时间界定,我们再看本书另一重要关键词——“话语分析”。

二、话语分析:符号/意义

80 年代诗歌,作为符号变成笔者考察的社会文本、文学文本,通过对诗歌话语的考察,我们不断揭示隐含其后的意义。海登·怀特的“话语”理论为笔者提供了较科学的研究基础。“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蕴,呈现各种权力关系的角逐与互渗,对其审视,也指出作为 80 年代文化重要样式的诗歌在与同期文化互动的意义所在。

话语,源自拉丁文 *discursus*,其动词 *discurrere*,意思指“夸夸其谈”。《牛津英语辞典》将其定义为“通过言语进行思想交流”。巴赫金认为,话语是一个言语交际实体,句子是一个语言单位,而话语则是一个交流单位,话语涉及三个角色:发话人、受话人和由发话人所发现的词语中的人。福柯的话语定义则以“陈述”或“已言说的事物”为参照系,话语作为知识谱系里面存在着权力机制。曼弗雷德·弗兰克在《论福柯的话语概念》中指出,“一种话语是一

种言说,或具有(不确定的)一定长度的一次谈话”^①。20世纪40至50年代,新批评派最先启用“话语”概念,将其作为区分体裁(文类)的一个方法,因此有了“诗歌话语”与“小说话语”的说法。话语标出差异,话语确定共性。话语分析开始被越来越多地用到文本与语篇分析当中,通过话语的谱系分析权力是如何生产的,话语分析,变成一种怀疑性的、批判性的、对抗性的、且不断生长的理论视角。

“话语”这个概念与隐喻相关。亚里士多德曾从意义转换的角度对隐喻进行分类,而意义的转换正是“转义”的基本含义。亚里士多德将“日常语言”与“诗性语言”加以区分:日常语言是常规的,而诗性语言用的是超越平凡话语的非同寻常的词语,其中就包括隐喻性词语……但隐喻不可以滥用,因为它只是日常语言的修辞性附加,滥用隐喻就会使话语成为难以理解的谜。

从亚里士多德到17世纪,对“话语”转义的认识基本上被放在语言的层面上,视其为特殊的表达形式,归属于修辞学范围。

但是,从18世纪开始到维柯这儿,转义已经超出修辞学的范围,向认识论的方向发展,开始将转义限定为隐喻、转喻(换喻)、提喻、反讽。这也为本文选择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考察80年代诗歌话语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把80年代看作一个历史整体,而其中每个阶段对应着某种转义阶段,去不断认识各种转义的意义。维柯认为,这是四种主要转义,其他的修辞格均衍生于此。维柯依据这四种转义提出了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这四种转义和与其相对应的文明周期的时代分别是隐喻(神祇时期)、换喻(英雄时期)、提喻(人类时期)和反讽(颓废和重复时期)。^②显然,维柯不再把转义视为对语言的附加的修饰性成分,而认为语言结构在本质上就是转义的(tropological)。诗性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分也不再明显,而变成一个转换的系统。

① 此处“话语”概念及巴赫金与福柯的主要观点参见陈永国:《话语》,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22—228页。

②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44页。